

开篇 世纪回眸

当历史的时钟走到 1997 年时,21 世纪的曙光已在天际升腾,人类将开始一个新的百年历程。

在世纪的交汇处,一部风云变幻、气象万千的世纪雄文展现在泱泱世界面前。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正以各自的独特方式,用不同的笔触为百年历史长卷写下最后一页。迅速崛起的中华民族,以其勃勃生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成为这一页中最为耀眼夺目的闪光点。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把一个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在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以及在城市化、科学、教育、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昔日不可比拟的巨大成就。

中国,这一沉睡了数百年的“雄狮”正在觉醒;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舒展其经济和政治的筋骨开始腾飞。而我们身边已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一切,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将按已确立的正确方向继续走下去。

到 1997 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情况良好,各项改革正按计划顺利进行。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成功地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民族地位空前提高,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

1997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划中国在 21 世纪的社会发展战略。

中华民族将以其无限的生机、不竭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书写人类历史在 20 世纪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页，昂首跨入 21 世纪。

然而，当我们伫立于世纪之交，回眸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中国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拖着孱弱的身躯，跌跌撞撞地走进 20 世纪的。而此时，中国社会已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痛苦深渊中沉沦了整整 60 个年头。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的演变格局也从渐进的积累性变迁改变为急剧的传导性变迁。由此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连绵不断的入侵，使中国社会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旧的严酷的封建压迫外，还要遭受新的残暴的民族压迫，陷入了屈辱与苦难的深渊。

西方列强无休止的侵略与掠夺，加上封建势力的腐朽统治，致使中国主权丧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满目疮痍。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由繁荣的顶峰跌入了衰败的谷底。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不止一代中国人的心头。

此时的中国，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中国，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中国，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任人宰割的中国。

民族不能独立和国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民族的全面振兴即实现现代化。没有民族的独立，不可能

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而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不是致力于实现现代化，而是解决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即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应着时代的呼唤，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天起，先进的中国人便一批批地站在时代潮头，为挽救民族危亡，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奋起抗争。谱写了一曲曲悲壮异常响遏行云的中华正气歌。推动着中国一步步走向独立、走向现代化。

一部分感觉敏锐的封建士大夫，首先被鸦片战争的炮声惊醒，成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逐渐成为许多先进人士为拯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找真理的思维——实践模式。

洋务派最早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并把“长技”具体化为西方的科学技术。然而，这种在经济政治制度上维持中世纪封建主义根基，而仅在物质层面上适当搞点西方式工业化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实现洋务派所预期的“自强”、“求富”的目的。1894年，日本人轻而易举地打败了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至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近20年的洋务运动，遂宣告彻底破产。

与封建士大夫探求改造中国之路的同时，农民阶级也行动起来。19世纪60年代，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场农民大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作为一条革新之路，却未能提出一套实现民族独立和振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纲领。洪秀全向人们所描绘的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天国蓝图及铺设的通向这一理想社会的大道，终因缺乏现实支点而变得虚无缥缈。农民革命之路最终变成了一条死路。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康有为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试图走一条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路，明确提出了走向资本

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纲领，并力主在不触动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平缓渐进地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阻挠和镇压，这条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最终也宣告破产。

19 世纪，在中国有三种社会力量，尝试了三条不同的革新道路，到头来都是死路一条。不过，每一个方案的破灭，都为下一个具有更多现实合理性的新方案出台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成为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国人民是带着迷惘和彷徨踏入 20 世纪门槛的。到 20 世纪初年，人们仍没有找到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有效的现实道路。中国，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举步维艰，茫然四顾，不知所措。

20 世纪初年，一位身着长布衫的热血青年，伫立在湘江岸边，面对“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大自然，不禁慨然叹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青年毛泽东的这句发问，持久地回荡在 20 世纪的华夏大地，回荡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

谁主沉浮，说到底就是谁能主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就是看谁能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踏准时代脉搏，反映时代要求，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完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

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与选择。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抱着“振兴中华”的宏图大愿，首先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主演了一幕开混沌、奠乾坤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活剧。

孙中山创立了三民主义理论，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构成这一理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

主义的逻辑构架，恰恰就是近代中国人民所担负的历史课题所要求解决的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实现现代化的政治纲领与经济纲领。这一理论不仅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改善生活的愿望。

与维新派不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实践中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暴力革命，坚决主张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和非法的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现政权，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美国式民主共和制度、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树立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在许多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孙中山所代表的阶级和使用的理论武器，毕竟是落伍和陈旧的。由于阶级局限、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无论是革命理论还是革命实践，都存在种种缺陷、失误和不足，因此，经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成为“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摘走，共和国成为一块招牌。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没有出路了。

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大力支持下，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1927年4月，建立了南京政权，并在随后的几年中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以城市为基础的仿效德国模式的发展趋向”。^①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景观在30年代之后发生了许多变化，经济上竭力扶植官僚买办资本，压制民族资本，维持封建土地关系；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

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蒋介石所确立的中国社会发展趋向，与历史发展潮流相背离，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现代化进程，相反，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指望蒋介石集团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所谓“第三种势力”（或“中间势力”、“民主派”）。它们试图另外开辟一条使中国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实践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因在中国缺乏生存土壤而难以存活：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不容许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广大中国人民也不允许经由资本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动员广大人民支持他们的方案。总之，“第三条道路”不可能是国家、民族的真正出路。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 年 7 月 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 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了。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完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方向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从诞生的那天起，中国共产党就投入到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之中，积极探索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方法与途径，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

20 世纪中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同国民党新军阀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排除了党内“左”的和右的干扰，开辟

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在理论上，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政治伟人和思想巨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概括和理论提升，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提出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指出了一条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新路。

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标志着百年来中华民族耻辱史的结束。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在经过中国共产党人28年的艰苦努力后，终于完成。随后，毛泽东根据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论。20世纪中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为民族的全面振兴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20世纪末，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完成后，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便落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的肩上。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五六十年代作了初步探索，从正反两方面写下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导言。在新时期，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全面认识中国国情和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

比较系统地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提供了伟大纲领和哲学基础，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了理论思维之翼。同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

一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成功地开辟了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正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在中华民族为寻求出路而进行的百年探索中，最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现代化的正确方法和道路，并最终完成了 1840 年以来中华民族所肩负的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而且开始了民族的振兴和腾飞。

纵观中华民族即将走完的 20 世纪百年历程，可以看出，20 世纪是一个探索的世纪，是中华民族在不断革命中走向复兴的世纪。

中国也在这曲折的探索和不断的革命中前行，留下了一串蜿蜒曲折、顽强向上的足印。

神州陆沉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与屈辱。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

路在何方？

历史在这里沉思。

中国，这片亚欧大陆东缘广袤而丰饶的土地，滋养了勤劳、勇敢和善良的中华民族。

远在上古时代，栖息在这里的原始初民，筚路蓝缕，开辟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源头。而中华文化同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一起，点燃了人类的文明之火，烛照着先民们走出空荒和愚顽这块历史的沼泽地。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其不竭的智慧，锲而不舍，在不断地创造中，使中华文化的历史高峰叠起，不仅保持了自己政治与文化上的惊人统一，而且在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世界文明史上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当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这片泥沼中举步维艰、徘徊不前时，世界文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7世纪40年代，英国首先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并

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世界文明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在 17 世纪 40 年代的世界东方，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已是桑榆暮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得以延续。

（一）末世苍茫

在漫漫中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都是以“朝代循环”模式进行着。每个王朝建立后，大都经历一个兴盛时期，然后走向衰落，引起内部分裂和农民起义。于是，旧王朝解体并引向另一个新王朝的建立。

如此循环往复。

当历史推进到 17 世纪 40 年代，这种以朝代循环为特征的微型变迁再次得以演示。日暮西山的明王朝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迅速土崩瓦解。此时，觊觎中原已久的满族贵族，在 1644 年乘机入关，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尽管在明末，中国社会内部已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尽管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对东方前工业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却无视这些变化，仍然按部就班地走了下去。

在内部和外部生存环境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巨变的时候，中国社会在原来的路上还能走多远呢？

闭关锁国

清王朝建立之初，开国君王们励精图治，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措施，出现了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康乾盛世”。此时，中国的疆域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成为一个拥有 1000 多万平方公里的空前统一

的国家。

盛极则衰，这是封建统治者难以摆脱的历史周期率。清王朝的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在乾隆之后迅速由盛入衰。随着国力趋衰和内忧日重，统治者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失去了对域外文化的恢宏气度和开放的心态，在忐忑不安中关闭了国门。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规定：只准粤海关广州一口对外通商，且对外商进出广州作了时间上的限制。最初规定 5 月或 6 月份进来，9 月、10 月出走；后又规定买卖只能夏秋两季进行。外商不能直接与自由商人接触，商品交易只能通过“十三行”这个政府许可的机构进行。另外，对外商的衣食住行都作了严格规定：不能直接跟“天朝”的官员洽商；不准坐轿；不能随便进城或出游。只许住夷馆，只许在逢八（如初八、十八、二十八）之日，到附近指定场所散步。尤其特别的是：外国女人不许进入广州城。道光十年（1830 年）地方官发现三名“洋妇”潜住英商馆，结果被勒令回到澳门。

当我们从社会经济领域来透视这一政策时，不难发现：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其缓慢，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这是清王朝推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中国社会内部没有出现欧洲那样强大的资产阶级。当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实行闭关政策时，不会遇到来自内部的强大力量的反抗。而自然经济又使得这种政策的执行成为可能。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产，分散地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广大农村。在这种封闭、自足的环境中，无论是国民还是统治者，既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依赖外国商品进口。1793 年，乾隆在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嘉庆在上谕中则对洋人斥问：“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

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使统治者所需之物，完全在国内解决。舶来品被视为锦上添花的东西，即使断绝来源，也不难在其广大统治区域内觅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使统治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此外，清王朝的闭关政策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纵观历史，在同样是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相对缓和的时候，统治者对周边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宽容的态度。汉唐之时，中华民族就展示了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域外文化。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和内容，都得到拓展与丰富。

鲁迅先生曾讲：“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怀介。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逃避退缩，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① 18 世纪后期，已是大清帝国的“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于是，清政府便在“推拒惶恐”之中，主观地认为，人民群众若直接地、频繁地与外来的异己势力相接触，无疑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清政府闭关政策的渐趋严格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是同步的。

虽然乾隆中叶以后的抗清斗争与外国人没多少关系，但最高统治者还是疑神疑鬼，努力把二者联系起来，认为：“外夷奸棍，潜入内地，诳诱愚民，恣行不法。”

乾隆十八年（1753 年）安徽马朝柱聚众谋反，本与外国毫无关系，但因马使用了“西洋寨”的名称，便引起清廷的警觉，进

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版，第 30 页。

一步严格了对天主教的禁令。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回民起义，恰逢四名外国传教士在陕西，尽管陕甘不是一个省份，但乾隆仍不放心，下令地方官员严加防范稽查。

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在国内活动的外国人，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只有将其清除干净，才有可能长治久安。因此，乾隆之后，随着政府防范中外交往的措施一个个出台，闭关锁国政策也就愈来愈严。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也是封建统治者的固步自封、虚骄自大心理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

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在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中浸淫日久，逐渐养成了一种虚骄的习性和妄自尊大心理，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别人和其他国家都是“夷狄蛮貊”。早在明代，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时，向中国政府呈献了一幅地图，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当他展示这幅《山海舆地图》时，没料到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抗议：中国何以如此之小？而且也不在“中心”！利玛窦只好重新把中国画在地图的正中。但这种技术性处理仍不被士大夫们所接受。在《中国札记》中，利玛窦说：“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①

清代，封建统治者继续坚持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来认识世界，成为支配从当权者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正因为如此，乾隆和嘉庆年间所修的两部《大清会典》里，竟把西洋诸国，如葡

萄牙、荷兰、意大利，都看作是清朝的朝贡国，把通商事件看成是朝贡事件。

正因为从上层官员到普通公众都认为外国皆属蛮夷，并无可取之处，那么，关闭国门、隔绝与海外的联系，也就不会被看成是于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有重大窒碍之举而加以反对。

一叶落知天下秋。透过闭关锁国这一政策，可以深切感受到大清帝国社会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没落和思想观念的僵化。

由于闭关锁国，使中国长期以来无现代意义的外贸和外交。清政府把外国来华贸易，看作是向清政府“臣服”，相应的对策是所谓“加惠远人，抚育四夷”。在这种朝贡模式的通商中，往往只重政治效益，轻经济效益，完全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激烈的贸易竞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是千古不变的信条。皇帝君临天下，四海臣服，万邦来仪。只有属国的进贡，无所谓外交。

相反地，为了拥有 4 亿人口的中国国内市场，英国政府迫切希望和中国建立平等正常的外交关系。1793 年，英国派出一个由 700 多人组成的马戛尔尼外交团。该使团以庆祝乾隆帝 60 大寿为名，实际目标是希望与清政府谈判，改变现行的贸易体制，扩大通商。此时，仍然沉溺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朝统治者，对于英使来华的复杂的国际背景毫无洞悉，竟仍以贡使之礼待之。

在朝贡体制下的中国与属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君臣关系在国际关系上的投影。中国的政治哲学向来认为没有不跪之“臣”。而英国人则认为三跪九叩之礼，不仅对使节本人是一种屈辱，更为重要的是，它隐含使节之君主为中国皇帝的附庸之意，绝不可接受。

由于马戛尔尼觐见皇帝礼仪之争，使乾隆帝“甚为不惬”，接待规格立即改变，“所有格外颁赏，此间不复颁给。”从此之后，中

英外交中的“礼仪之争”一直是困扰清王朝统治者的外交死结。表面上看，外交礼仪之争似乎是文化之争，深藏其后的则是平等国家的主权之争。清朝统治者仍用传统的宗主的眼光去打量西方国家，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藩属或“下国”，而不存在什么平等的主权国家。当马戛尔尼使团被遣回时，除了得到若干玉如意、丝、茶、瓷等“赏赐”外，还有乾隆皇帝的三道给英王的训令式的敕谕，其开首总是：“奉天承运敕谕英吉利国王得悉”，十足的宗主派头。

1816年，当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觐见嘉庆皇帝的礼仪问题再次成为中英外交争执的焦点。由于英使阿美士德对三跪九叩礼的要求坚持不允，嘉庆帝异常恼怒，降旨：“即日遣令出京。”

由于中国对外关系中，只有朝贡与藩属而无平等的国家关系存在，清王朝统治者从来未想过要与外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这种观念反映在对外关系的体制上，表现为从无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早在1648年，欧洲各国就订立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建立外交部并互派驻外使节。但中国的官制在18世纪仍旧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没有负责外交事务的专职机构，更不允许外国在中国建立大使馆。

面对以均势为生存原理，讲求实力、弱肉强食的“渗透”与“扩张”式的西方外交体制，清政府的朝贡体制表现出相当的迟钝与惰性，没有主动地作出适合近代外交制度和外交运作方式的变革。显然，这与闭关锁国有密切关系，因为在闭关状态中，不需要外交。同时，对深刻变化着的外面世界一无所知，统治者也不认为这种变革是必要的。

可见，闭关政策严重阻滞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进程，也使中国无法找到自己在近代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无法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预防和消弭战争的灾祸，削弱了中国应付外来挑战的能力。

闭关锁国的另一恶果，是统治阶级闭目塞听，观念陈旧，背离潮流，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发展。

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子”。“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① 以此种华夷秩序观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懵懵懂懂。到鸦片战争前，英国与清政府虽有 200 多年的来往，然而，清朝统治者仍然对其不甚了解，连是岛国还是陆国也搞不清楚。直到 1842 年，已与英国打了两年仗，道光帝竟问臣下：“英国到新疆有没有旱路可通？”

闭关锁国的结果，是那些认为“西人”为“化外蠢愚”者，自己倒越来越愚蠢。

对于西方的科技知识，清朝当权者同样知之甚少，不感兴趣。

乾隆年间，法国人蒋友仁把哥白尼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清统治者则坚决拒绝接受。钦天监官员杨光先则断言：如果大地是一个圆球，球上的人与球下的人脚心相对，那么，球下的人岂不是倒立的吗？据此，他认为“地圆说”纯属无稽之谈。1793 年，英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各种自来火枪、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 29 种。但清朝只当作贡品收藏。使华期间，马戛尔尼还邀请清名将福康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的火器操练法。对此，福康反应颇为冷淡：“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闭关锁国政策，犹如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中国与世界隔绝开来。人们闭目塞听，不愿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直接影响了本国科学文化的发展，抑制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使人们的

宋·石介《徂徕集》卷 10。

思想观念难以作适应时代要求的调适和转变。这说明，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误国，导致民族自杀。

纵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到，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向发达的形势下，历史已经不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后发展国家自生近代工业文明，只能通过学习、摄取的途径，走向现代化。但是，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中国既无法输入有形的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输入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精神文明。这样，就使中国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上半叶，丧失了现代化启动的最好时机。

无论如何，在世界朝着一体化发展的潮流面前，中国的门户迟早是要开放的。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开放。

对中国在清王朝时期的闭关政策，长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颇多指责，并企图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以掩盖其罪责，这是徒劳的！中国是一个主权大国，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内外政策。闭关也好，开关也好，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并没有侵犯其他人的利益。第三国，尤其是在中国犯下罪行的侵略国，是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的。可以而且应该对自己祖先实行的闭关政策进行检讨的，是中华民族自身，当代中国人。

社稷败落

清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创下 134 年的长治久安的记录，尤其在乾隆时期，开疆拓土，极一时之盛。但是，在大清帝国兴盛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连续用兵，军饷耗费极大，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要控制和管理如此广大的疆域也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 19 世纪初，潜在的危机已表面化、公开化。

这首先表现在大清帝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在封建时代，整个中国经济几乎全部是农业部门，其他部门或是需要依赖农业提供原料，或是处于为农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地位。自 14 世纪以来，中